

文化自信背景下的译语话语权：现实依据与应对策略

段胜峰,廖 琪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成就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并争取译语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元文化背景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为跨文化传播及争取译语话语权创造了客观条件。当下,中国正处在争取译语话语权的机遇期,在争取译语话语权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文化二元对立等挑战。因此,一要明确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的现实依据与立足点,创新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方案;二要冲破文化二元对立,实现翻译各利化,这样中国译语话语权才能乘势而上。

关键词:译语话语权;文化自信;新媒体;话语霸权;中国方案;现实依据;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4-0130-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4.013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Realistic Basis and Coping Strategies

Duan Shengfeng, Liao Q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promoting China's cultures "to walk abroad", and endeavoring for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newly formed media era have also created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triving for the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Currently, China stands in opportunity period to struggle for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in which it shows its unprecedented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However, apart from thos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such as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and cultur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foothold of China's struggle for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to innovate discourse system to contribute Chinese solutions, and simultaneously to break through cultural dichotomy to realize translation's individual interests, so that China's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can ride on the momentum.

Key words: C-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cultural confidence; new media; discourse hegemony; Chinese solution; realistic basis; coping strategies

收稿日期:2023-02-22
基金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创新资助项目(21YH021CX3)
作者简介:段胜峰(1971—),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传播、语言学及教育基本理论等研究;
廖 琪(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跨文化交际。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间隙吃韭菜盒子的细节吸引了外国媒体记者的注意,国内一些主流媒体也进行了话题讨论与转发,进而引发了国内民众对“韭菜盒子”外译法的热议。在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新闻周刊》的评论区,点赞数排名前三(分别为1.2万次、9 057次、5 998次)的评论都认为应该翻译成“Jiucai Hezi”,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使用汉语拼音的音译法,认为此种译法能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原语言文化特色,包括发音拼写特色、语法修辞特色等。

这一实例充分表明中国民众坚持保留自身语言文化特色的意愿非常强烈。一方面,这是对自身语言文化的积极认可与充分肯定,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这种自信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部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基本原则^[1],也就是说,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译文并非是绝对中立的,而是有一定价值偏向的,往往能够体现当事民众维护自身在译语话语权方面的诉求、权利和利益。

一、译语话语权研究现状

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后得到的产物即为话语。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话语与权力不可分割,话语是非中立的,总会受到某一权力的制约,如让该权力得以体现,并对该权力加以维护。也就是说,人类的交际不仅在于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更是一种权力的博弈。而研究跨语言、跨文化之间的国际交往,就不得不提到对译语话语权力的争取问题。熊欣将译语话语权定义为:传播国通过适当的译语形式主动实现自身语言及文化在他者语言与文化中的诉求,自身的主张为译语受众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或认知^[1]。文化是译语话语权的根基,在借助他者语言形式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保留本国语言异质性和文化特色,以此更好地争取、维

护对本国话语的构建权和解释权。受众是获取译语话语权的关键,译语话语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力,或受众对译语话语的接受度,直接影响最终获得话语权的份额。译语话语权的争取不单单有助于更好地传播自身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更有助于促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利益,并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对话、谋求共同发展。

本文在主题栏中以“翻译”和“话语权”为检索词,在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中进行检索(截至2022年9月30日),共获取文献98篇,通过人工剔除会议报道、招生简章以及与本文主题关联性较弱的文献资料等,最终得到文献75篇。进一步分析文献内容后发现,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宏观上聚焦翻译学学科建设与外语人才培养、发展中国译论、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二是中观上推进对外翻译工作(外宣翻译、文学翻译、翻译出版等)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三是微观上着眼翻译与权利具体现象的分析,如对个别译本、某一类文化领域的英译展开研究。首先对译语话语权进行具体研究、详细分析的是学者熊欣,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从文化对外传播、对外媒体报道等方面对译语话语、译语话语权进行了深度剖析;另一方面,从译语话语权的角度对中医药、中国茶叶等领域的英译展开更为具体的研究^[1]。因而以译语话语权为主题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译语话语权丧失的表现、丧失原因的分析、翻译策略的选择、话语权的重构等方面,鲜有研究透过译本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历史时代演变的大背景下看待译语话语权的丧失与夺回。

这次对于“韭菜盒子”译法的争论看似是一次平常的坊间辩论,实则是中国民众文化自信意识普遍觉醒下积极争取译语话语权的行为表现。鉴于此,本文拟对当下中国在世界之林争取译语话语权所具有的现实依据和面临的挑战

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

二、我国争取译语话语权的现实依据

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之间,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等,并不是一个个没有任何交集、毫不相关的元素,而是互相影响的。这些相互影响的元素实则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多元有机系统,且每个元素系统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处在边缘位置,有的处在中心位置^[2]。当原语文化系统发生不稳定变化时,受原语国家的经济水平、意识形态、语言元素等子系统的影响,需要体现国家利益、展示国家诉求之时,文化外宣翻译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带动着走向中心地位,争夺译语话语权意识便会随之萌发与觉醒。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民众文化自信意识普遍觉醒,世界呼唤多元文化,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提升中国译语话语权迎来了关键的机遇期。

(一)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成就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势必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为文化建设高潮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必将推进文化建设的高潮^[3]。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

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建设也逐渐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文化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整体上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323.06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065.02亿元^[4]。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得到完善,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分别由1949年的55个、21个^[5]增至2022年的3303个、6565个^[6]。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突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世界遗产有56项,位列世界第二;截至2022年11月,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列世界第一。影视作品助力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成果显著,推出的影视作品《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之水门桥》《觉醒年代》《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等均在国内外获得了不错的反响。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好评如潮,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总之,我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还有精神生活的富裕,而中国人民文化自信意识正是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逐渐觉醒、发展并坚定的。

(二)汉语拼音逐步国际化和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为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创造了客观条件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民众文化自信意识的普遍觉醒让中国人民产生了争取译语话语权的主观意愿,那么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语拼音走向国际化,以及信息时代下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等,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争取译语话语权创造了客观条件。

当下,世界各国普遍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拼音系统正在逐步国际化。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50余

所孔子学院和1172余个中小学孔子课堂^[7];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中文教育,81个国家(地区)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达8万多所,国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3000万^[8]。汉语拼音是国际汉语教学的基石,是汉语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大辅助工具。事实上,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具有交际性质和交际价值的文字本身。汉语拼音搭乘孔子学院的“便车”,助推了汉语音译词在海外的传播,拼音和汉字“中为洋用”正在成为英语圈国家的一种新现象^[9]。另一方面,众多孔子学院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化主题活动,涉及中国美食、传统汉服、传统中医、中华戏曲、诗词书画、太极功夫、中国传统节日等各个方面,让全世界对中华文化有了一个更为全面、详尽的认识,进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中西文化的交流。

此外,由传统媒体转型发展而来的新媒体也让中华文化、中国话语的传播享有了更大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多模态性上。首先,在话语传播速度上,新媒体的即时性确保了中国国内的热点话题、文化知识等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数字报刊、社交媒体等各大传播平台上。如在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短片中呈现的“立春”文化词,隔日便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介绍:“Li Chun” in China’s traditional lunar calendar is the day tha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eason for growth。其次,在话语传播范围上,新媒体的互动性能无限扩大话语传播范围,形成传播上的“涟漪效应”。如外国媒体NBC Olympics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谷爱凌吃韭菜盒子的视频片段后,不少外国友人纷纷转发,并在评论区留言,甚至相互答疑解惑: Is she having an Arepa? It’s a Chinese chive pie。最后,在话语传播形式上,新媒体的多模态性让信息、文化、话语以文本、图像、视频等多样化的形式实现传播。其中,视频这种媒体形

式又因其直观、生动、立体的特性,在文化传播中备受青睐,其中尤以李子柒的原创视频最为突出,视频标题中出现的“Zongzi(粽子)”“Labacongee(腊八粥)”“Mapo Tofu(麻婆豆腐)”等文化词都较好地体现了中国语言的文化特色,为争取译语话语权助力。

三、我国争取译语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在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新时代译语话语权的争取上正处在关键的机遇期,但同时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文化二元对立等方面的挑战。

(一)西方话语霸权

西方话语霸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独断,完全以自己的话语为讨论或执行的标准、对他人的情况不作任何考虑;二是强势,以自己的话语为绝对权威,不容他人质疑或不完全执行,甚至无视对方或他方的情感和利益^[10]。西方话语霸权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它的核心要义是强调西方文明是先进的,代表着理性、科学、民主、文明、独立、自由;而非西方文明则是愚昧、落后、独裁、奴性^[11],因而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已有的文化基础、资本优势、技术支持等,独断且强势地把控住了几乎整个世界话语场,不是“我方”的“他方”就成了霸权国家的“眼中钉”。这就造成了当下中国的尴尬局面: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话语地位却没有得到同步提高,仍处在弱势地位。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国话语被独断且错误地认知,如美国将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国际性合作模式简单地等同于自己话语体系中的“China’s Marshall Plan”和“New Silk Road”;对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附上“ultranationalist”“America’s nightmare”“military”“extreme anxiety”等负面标签^[12]。二是西方霸权国家凭借自身的绝对权威,将一些无中生

有的话语强加给中国,让中国多次陷入被恶意误解、被污蔑诋毁的艰难处境,如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大肆炒作“实验室泄露”等阴谋论,把矛头直指中国武汉;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甚至在推特上将新冠病毒称作“Chinese Virus”。这些毫无根据的歪曲、无中生有的污蔑是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抹黑,成为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二)文化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思维隐含着一种极端的本质主义思想,将文化视为一个抽象概念,既不受时间影响也不受实践干扰,文化之间因而成为相互隔绝的封闭实体,形成不可跨越的壁垒,容易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13]。中西文化形成之初,由于所处的地缘格局全然相异,所经历的经济、政治、社会形态之演变亦各不相同,故而出现了中西语言文化的异质现象。而文化作为话语权的深厚根基,在译语话语权的争取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文化的交流与交锋,从而极易落入文化二元对立的陷阱,即强调绝对的非此即彼。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接连战败,清朝政府签订了一项又一项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随之爆发开来,“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废孔学”的呼声此起彼伏,极少数国人开始偏激地要与中华传统文化彻底割裂,由此引起的“文化自卑”心理以及潜意识里的“崇洋情结”直到现在仍留有痕迹。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也遭遇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复出的阻碍。在东西方文化交锋的过程中,文化保守主义表现为东方本土文化对西方强势文化输入的防范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捍卫^[14],因此,它与文化自信有一定的伴生关系,对本国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又因其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偏狭性,所以文化保守主义更多的表现是在文化不自信的情景下对本民族文化的固

守。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保守主义过于夸大中国模式,将这套“经济话语”转换为“文化话语”,甚至转化为“政治话语”,完全盲目地对其进行辩护,这样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15]。二是保守主义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为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过激、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如在此次“韭菜盒子”的译法争论中,就出现了一些“非拼音不可”或“英语万万不可”的极端言论。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是文化自信的不足,均不利于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

四、我国争取译语话语权的应对策略

在认清了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的现实依据与挑战之后,中国译语话语权要想乘势而上,获得一定的国际地位,一是必须创新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方案;二是必须冲破文化二元对立,实现翻译各利化。

(一)创新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首先,争取译语话语权,构建自身独创的一套话语体系是关键。在话语体系中传递本国的文化精神,彰显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体现本国的智慧主张,更加有助于争取、维护本国译语话语体系的构建权和解释权。其次,争取译语话语权,主动加强话语议题设置,参与全球治理,谋求共同发展,促进互利共赢。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创新话语体系为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给出了官方参考译文“human beings shar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国外的主流媒体,如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路透社、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等都采用了该译法^[16],随后经过调整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修订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而国外主要媒体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新,该翻译成为了维基百科的收录词条。不仅如此,“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短短时间内,先后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的决议和文件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具体的话语分支:“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China LatA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Asia-Pacif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uclear safet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由此形成的一套独创话语体系是从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寻找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破解“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

(二)冲破文化二元对立,实现翻译各利化

谈到译语话语权,第一反应往往是如何在译语中体现本国的话语权,即强调尽可能地保留本国语言异质性和文化特色,忽视了译语话语权的切实取得。因此,不得不关注受众对译语话语的接受度,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回归到了异化与归化二元对立的问题上。

事实上,异化与归化的二元对立也是翻译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都各执其理,前者要求“以异为异”,代表的是原语一方的利益,保证原语语言文化实现原汁原味地对外传播;后者则是要求翻译顺应译语语言文化习惯,考虑受众感受,为其提供便利。而考虑到事物的两面性,不妨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寻求一种“互存互荣”的动态平衡,实现“翻译各利化”,既考虑原语语言文化的传播利益,又不忘为受众提供便利,并帮助其享受引进文化带来的利益。基于此,提出“汉语拼音+变体”的各利化音译法助力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以汉语拼音为基础讲求的是互存中“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原则,实施各种变体体现的是互存中“考虑他者,对他有利”的原则。一是“拼音+简单释义”的翻译方法。在此次“韭

菜盒子”的译法争论中,多数一派坚持“Jiucai Hezi”译法,少数一派持保守译法“Fried chive dumplings”,却不曾有人提出采用合并兼顾的译法,如“Jiucai Hezi, a Chinese pocket pie”,一方面因为二元对立思维使然,另一方面想要减轻所谓的语言“负担”,但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译语话语权的争取没有捷径可言,“拼音+简单释义”的翻译方法,表面上给受众增加了“量”上的负担,但要实现“质”的飞跃,让受众在两种相异的文化之间搭建起联系的桥梁,就必然离不开“量”的积累。二是直接就汉语拼音进行变体的译法,即通过将其调整为符合英语的拼读和拼写规则,又最终得出近似汉字拼音的发音。在该翻译方法指导下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官方译本“Bing Dwen Dwen”,考虑到汉语拼音“Dun Dun”按照英文习惯发音,不再是“墩墩”,而是“蛋蛋”,于是官方将译词调整为了“Bing Dwen Dwen”,而“Bing Dwen Dwen”在冬奥期间火爆出圈,频频出现在外国人民的口中,可见该译法在争取译语话语权、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是成功的。三是“汉语拼音+类属性或描写性范畴词”的翻译方法。如2022年中国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与中国高端绿茶竹叶青联名的春茶“竹叶青”官方译名为“Zhuyeqing Tea”,用一舞一茶,携手传递我国茶文化。

总而言之,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道阻且长,然行则将至,势必要牢牢抓住时代机遇,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向世界展示中国亲和友善的大国形象,用中国话语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争取译语话语权只有行而不辍,才能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 [1] 熊欣. 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4):208-211.
- [2]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3(4):59-66.

- [3] 刘玄启.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相辅而行[J]. 当代广西, 2021(9):60-61.
- [4] 徐瑾. 文化建设蓝皮书: 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2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5]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5/content_5415076.htm.
- [6]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纪实[EB/OL]. 国家文物局, http://www.ncha.gov.cn/art/2023/6/1/art_2664_181901.html.
- [7] 赵晓霞. 15 年, 孔子学院建了一座桥[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12-13.
- [8] 孙春兰强调: 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22-12/09/content_5730892.htm.
- [9] 田源. 汉语音译词走红海外[A]//国家语言文学工作委员会. 语言生活皮书: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R].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0] 付黎旭, 董卫, 王宇红, 等. 文化翻译策略 从“归化”“异化”到各益化: 翻译学发展趋势及中日文化互译范式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84-85.
- [11] 张钰. “锐实力”与西方话语霸权的透视[D].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
- [12] 胡开宝, 张晨夏.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梦”英译在英美等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1): 89-97.
- [13] 高丽萍. 从对抗到对话: 摆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后殖民主义启示[J]. 中国图书评论, 2017(7): 30-33.
- [14] 李诗芹, 张可荣, 陈浩凯. 从软实力到影响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机遇、挑战与战略举措[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1-19.
- [15] 胡键. 文化强国战略: 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J]. 社会观察, 2012(2): 76-79.
- [16] 邓海丽. 中国时政话语的翻译策略: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及其传播为例[J]. 理论月刊, 2020(8): 21-30.

(上接第 68 页)

- [23] 张亚洲. 内部控制有效性、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J]. 财经问题研究, 2020(11): 109-117.
- [24] 冯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价值[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2(2): 48-59.
- [25] 周孝华, 王诗意. 纾困基金是否具有“造血”扶持之效?: 基于民营企业价值的视角[J]. 财经研究, 2022(3): 48-63.
- [26] 张立民, 李琰. 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公司治理和企业价值: 基于财务困境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2): 13-23.
- [27] 姜付秀, 王运通, 田园, 等.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7(12): 61-74.
- [28] 黄大禹, 谢获宝, 孟祥瑜, 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21(12): 41-51.
- [29] 鞠晓生, 卢荻, 虞义华.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 2013(1): 4-16.
- [30] 王新红, 曹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 来自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1(3): 42-50.
- [31] 聂兴凯, 王稳华, 裴璇.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 会计研究, 2022(5): 17-39.
- [32] 徐宗宇, 孙敏, 刘耀淞, 等. 分拆上市对企业集团价值的影响[J]. 华东经济管理, 2022(3): 106-118.
- [33] 段华友, 杨兴柳, 董峰.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统计与决策, 2023(5): 164-168.
- [34] 陈秀英, 王梦翠. 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05-116.
- [35] 赵晶, 孟维烜. 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9): 109-126.
- [36] 王琳璘, 廉永辉, 董捷. ESG 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5): 23-24.
- [37] 韩峰, 黄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98-110.